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编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XIII — XVII вв.)

蒙古史学史

十三世纪 — 十七世纪

(修订译本)

[蒙古] 沙·比拉 著 陈弘法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编

蒙古史学史

十三世纪 — 十七世纪

(修订译本)

[蒙古] 沙·比拉 著 陈弘法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修订译本/
(蒙)沙·比拉著;陈弘法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2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ISBN 978-7-5325-7630-2

I. ①蒙… II. ①沙… ②陈… III. ①蒙古族—史学史—研究—中国—13世纪~17世纪 IV. ①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3070号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修订译本)

[蒙]沙·比拉 著

陈弘法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875 插页 3 字数 247,000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7-5325-7630-2

K·2040 定价: 4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编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主 编

沈卫荣 乌云毕力格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鹤 乌云毕力格 刘迎胜 毕 波 余太山

李 肖 沈卫荣 芮传明 府宪展 荣新江 徐文堪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МНР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Ш. Бира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XIII — XVII в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78

《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俄文版扉页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编辑缘起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非常重视对国学,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以中国学术要与国际学术接轨为号召。西域研究,尤其是对曾经生活于中国西部地区诸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中国多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古代西域是一个民族迁徙、融合十分频繁的地带,亦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枢纽,对西域历史、语言、宗教和文化的研究是一门关涉多种学科的非国际化的学问。是故重视吸收海外西域研究的成果,不但有利于提高中国学者之西域研究的水准,而且亦有助于促进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吐鲁番学研究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联合编辑、出版《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西域研究在中国的开展,曾与近代中国的形成密不可分。清末中国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当时相当数量的爱国学者积极投身于“西北舆地之学”的研究,其成果对于中国领土不受瓜分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地位的确立和边疆疆域的界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国的“西北舆地之学”自清嘉、道以后,就因缺乏新资料、新方法而渐趋衰落,而西方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却因另辟蹊径而成绩斐然。以法国学者伯希和为代表的一批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誉的汉学、西域研究学者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和吐鲁番劫走了大量珍贵的西域古文献,他们利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用汉语古音和民族、异国语言互相勘同、比对等方法来处理、解释这些多种语言的古文献资料,其成就超出了中国传统的“西北舆

地之学”，在西方中国研究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尽管今日世界的中国研究从方法到内容均已日趋多样化，但西域研究依然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能够凝聚世界各国学者的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

从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具有西方学者不可企及的天然优势，不但数量庞大的有关西域的汉文古文献是西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而且西域语言中的大多数是中国国内诸少数民族同胞依然在使用的活语言。中国学者本应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西域研究虽然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一代杰出学者的倡导下有过短期的辉煌，但这个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当王国维、陈寅恪今天被国人推为数一数二的国学大师时，中国的西域研究还没有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这样的局面将阻碍中国学术赶超世界一流水平的进程，更不利于多元文化在中国的同存共荣与和谐发展。我们编辑《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意在激励中国学者在这个特殊的领域内充分吸收国际学术界的优秀成果，然后发挥我们潜在的优势，扬长避短，冀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与国际一流学术水平间的距离，重兴绝学！

沈卫荣 李 肖

二〇〇七年五月

目 录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编辑缘起	001
引 言	001
第一部 蒙古古代与封建主义确立时期的历史知识 (十四世纪末之前)	011
第一章 蒙古史学史的开端	012
第一节 蒙古文字历史产生的前提	012
蒙古人历史知识的起源	012
蒙古文字历史产生的历史文化前提	029
第二节 《纽察·脱卜察安》(《蒙古秘史》)——蒙古史学史上 的第一部巨著	030
《纽察·脱卜察安》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	030
《纽察·脱卜察安》的史实与历史观	040
《纽察·脱卜察安》的思想内容	055
《纽察·脱卜察安》——蒙古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	061
第二章 帝国时代的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至 十四世纪)	063
第一节 元朝时期蒙古人的史学活动	063
《察罕·图克》——忽必烈合罕时代的蒙古史学文献	063
《察罕·图克》的基本内容及其成书年代	064

《察罕·图克》的基本历史政治思想	079
第二节 《圣武亲征录》——一部蒙古历史著作	085
第三节 从汉文和波斯文史籍看蒙古人的历史知识	089
中国蒙古合罕宫廷历史编修活动 《元史》——一部蒙古史学资料	089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一部关于蒙古人历史知识的史籍	098
拉施特丁《扎里阿特—塔瓦里黑》与蒙古人的历史知识	109
 第二部 封建主义发展时期与封建割据时期的 蒙古史学史	 129
第一章 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上半叶的蒙古史学史	130
第一节 十五世纪时蒙古人的史学传统	130
第二节 封建佛教史学史的产生(十六世纪下半叶至 十七世纪初)	 138
蒙古的历史文化状况与蒙古人史学活动的加强	138
封建佛教史学史开始形成 首批史学家	142
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	148
固什·却尔济	157
萨迦·端珠卜	169
佚名氏《阿勒坦·脱卜赤》	175
《甘珠尔经》蒙古文译本各卷后记的历史政治意义	181
第二章 十七世纪下半叶的蒙古史学史	188
第一节 罗卜桑丹津的编年史《阿勒坦·脱卜赤》 (《黄金史纲》)	 189
第二节 《沙拉·图吉》(《大黄史》)	203
第三节 萨刚彻辰《额尔德尼·脱卜赤》(《蒙古源流》)	211
第四节 《阿萨拉克齐·耐日图—音·图克》 (《阿萨拉克齐史》)	 234

引用书目	243
人名索引	285
译后记	303

引 言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作者计划编写的革命前蒙古史学史(从古代至1921年人民革命胜利)的前一部分。作者考虑到,要完成全部著作势必花费相当时间,故决定将本书作为全部著作的第一部交付出版。

从俄国学者奠定蒙古史科学基础至今,大约已经一个半世纪了〔见115; 62; 72; 65〕。在这段时间内,各国蒙古学家在搜集、刊布和研究蒙古历史著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最近二十五年来,蒙古编年史或编成丛书刊布,或单行出版,这更加激发了研究家们对蒙古历史著作的兴趣。1952年,哈佛燕京大学(美国)所出的“Scripta Mongolia”〔《蒙古文手稿》〕丛书问世。这套丛书以照相制版的方式刊布了罗卜桑丹津的《阿勒坦·脱卜赤》(《黄金史纲》〔82〕,以蒙古人民共和国1937年首次发表的原本为蓝本)、萨刚彻辰的《额尔德尼·脱卜赤》(《蒙古源流》)的三种抄本〔83〕、拉西彭楚克的《宝罗·额利赫》(《水晶念珠》)〔84〕等编年史巨著。著名的蒙古学家们为刊布这批著作所写的引言甚有价值。其中,田清波〔安·莫斯塔尔特〕为刊布萨刚彻辰《额尔德尼·脱卜赤》而撰写的引言,可以说是一篇独立的论文。这篇文章对该编年史的各种版本不仅从版本学角度作了精辟分析,而且从历史学角度进行了可贵探索。

从1954年起,威斯巴登开始刊出以“Göttinger Asiatische Forschungen”〔《哥廷根亚洲研究》〕为其总标题的专著丛书,1959年起更名为“Asiatische Forschungen”〔《亚洲研究》〕。这套丛书刊布了

如下编年史:佚名氏《阿勒坦·脱卜赤》〔81〕,《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97〕,《察罕·图克》(《十善福经白史》),《成吉思合罕史》或曰《青年宴》,《大黄史》即《沙拉·图吉》,佚名氏《察哈尔史》(最后两部编年史以附录形式发表在瓦·海西希的书〔241〕中),等等。

从1958年起,哥本哈根也开始出版名为“Die Mongolischen Historischen Handschriften”〔《蒙古历史抄本》〕的丛书。这套丛书由瓦·海西希编辑,是丹麦东方学家卡·格伦贝赫创立的“Monumental Linguarum Asiae Maioris”〔《大亚细亚语言文献》〕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套丛书刊布了不少蒙古编年史,如《额尔德尼·额利赫》(《宝贝念珠》)〔94〕。

1960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版“Monument Historical”〔《历史文献》〕丛刊。该丛刊受到了学术界的热烈欢迎。这套丛刊已出版若干卷,刊布了一系列编年史和历史著作〔50〕。

此外,应当提到的主要还有苏联、匈牙利和日本等国在刊布和研究蒙古历史著作方面所做的工作。尼·帕·沙斯吉娜根据三种抄本整理出版了《沙拉·图吉》的集校本(附异读索引、俄语译文〔79〕和注释)。列·谢·普奇科夫斯基出版了贡布扎布所著的编年史《冈嘎一因·乌鲁斯哈尔》(《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史,名曰恒河之流》)〔63〕,书中有人名索引和族名索引。1970年,普·巴·巴拉登扎波夫翻译出版了《阿勒坦·脱卜赤》,全书分三部分:研究部分,译文和注释部分,附录部分(包括抄本A的照像制版样,异读情况,引用书目,人名、族名、地名索引)〔58〕。尼·帕·沙斯吉娜译注出版十七世纪的编年史杰作之一——罗卜桑丹津的《阿勒坦·脱卜赤》〔80〕,也是其中的一件大事。

匈牙利蒙古学家在刊布和研究蒙古历史著作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例证之一便是路·李盖提对《纽察·脱卜察安》(《蒙古秘史》)所作的研究。他将这部史籍由旧蒙古文译成了匈牙利语,并用新的转写方法音译刊布了蒙古文全文〔101〕。

日本学者服部四郎〔216〕、小林高四郎〔253〕、植村清二〔297〕、小

泽重男〔269〕等人也对《纽察·脱卜察安》、《阿勒坦·脱卜赤》进行了刊布和研究。

从版本学角度最先对蒙古史籍进行空前认真的综合性研究的著作,当为策·扎木察朗诺的名著《十七世纪的蒙古编年史》〔158〕。该书真正奠定了科学分析蒙古史籍的基础。

蒙古人丰富的历史著作遗产引起了世界学术界越来越大的兴趣。不过这种兴趣依旧主要表现在对已刊布的史籍进行描述和分类上,充其量也不过是从语文学和版本学角度作一番研究而已。而真正从史学史方面对其进行探讨,还是不久前才开始的,无论如何不早于50年代至60年代。

1953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发表了列·谢·普奇科夫斯基的论文《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蒙古封建时代史学史》〔194〕。该文是从史学史角度对蒙古历史著作进行概述的首次成功尝试。作者十分重视从现代史学史科学的方法论立场出发对蒙古历史著作进行研究。1959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版了贺·佩尔列的小册子《略论革命前的蒙古史学史》〔131〕,对蒙古人的史学知识的发展史进行了概述。瓦·海西希的著作《蒙古人的家谱与宗教史著作》〔242〕是蒙古史学史领域的重要著作。这部力作,特别是它的第一部分,着重分析了作者所研究的各部著作的内容,确定了各部编年史作者所引用的史料来源,介绍了各位史家的生平。但该书的第二部分,就学术内容而言,却远逊于第一部分,只刊布了十九世纪的四部蒙古编年史复制件。

1960年,本书作者曾写过一本题为《藏文蒙古历史著作》〔141; 226〕的书。书中论述了蒙古人用藏文写成的蒙古史著作。作者的另一部著作是从史学史角度对史籍巨著之一——达木丁的《金册》所进行的研究尝试〔142〕。199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通报》还发表过作者研究蒙古史学史遗产的论文〔120〕。

伊·雅·兹拉特金为《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九卷)撰写的词条“蒙古史学史概述”对蒙古史学史的研究工作是一大贡献。该词条分析研究了蒙古人从古至今历史知识发展的各个基本阶段〔162,第

611—617 页]。

以上所述,事实上就是世界蒙古学界近二百年来所有有关蒙古史学史著作的一个概况。从上述概括介绍中不难看出,蒙古史学史这块“处女地”远未得到“开垦”;大约正因为如此,在某些著作中也就偶而会出现一些有关蒙古史学史的错误论点。比如,约·汤普森在其名著《史学史》中曾说过如下一段话:“直到事隔多年之后,蒙古人自己才开始记述成吉思合罕及其子孙的伟大业绩。唯一保存下来的用蒙古文写成的蒙古史著作,乃是萨刚彻辰的著作……其原本是 1820 年在西藏发现的(?!——沙·比拉注)。该书还从汉文史籍中摘录了若干内容作为补充。这大概就是我们所知的有关蒙古人历史方面的全部知识了。”〔292,第 354 页〕这一论点的谬误之处显而易见。

50 年代至 60 年代期间,伦敦大学东方学与非洲学学院大力研究亚洲各民族(印度、巴基斯坦、锡兰、中国、日本、中东)的历史著作,并以“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People of Asia”〔《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为总题目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但是,在这套丛书中竟然没有为蒙古史学史提供一席之地(如果除去欧·拉铁摩尔的短文《蒙古游牧社会史》不计的话;即使这篇文章也没有直接谈到史学史问题〔258,第 328—343 页〕)。

如此看来,可以大胆断言,除了少数蒙古学家之外,蒙古史学史对于世界学术界依然是个未知数。后来,在 1960 年斯德哥尔摩第十一届国际史学家大会的“方法学与一般问题”组在讨论英国历史学家马·巴特菲尔德的报告时,我曾指出,世界史学史不能仅仅局限于西方史学史〔218,第 40 页〕,而应当包括内容丰富的东方学史,其中自然也包括蒙古史学史〔218,第 40 页〕。而后,到下一届即第十二届国际史学家大会(维也纳,1965 年)时,“方法学与现代史”组便专门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我的题为“蒙古史学史”〔224,第 49—56 页〕的报告。这个报告激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与会代表们的发言和报刊上的反响可以为证〔225,第 577—586 页〕。

本书作者研究的课题无论从年代范围来看,抑或就材料范围来

看,都是很广的。探讨蒙古史学史的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新而且杂,且多半无人问津;要彻底解决,恐非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胜任。

在研究蒙古史学史的过程中,我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将它看作是一门研究各民族历史知识发展过程的独立学科。

从这一原则出发,我力图考察蒙古人的历史知识史,政治、哲学、宗教思想史,并且历史地研究和阐明蒙古历史学家著述中的方法学问题。我的任务不仅在于确认某一现象,而且在于用蒙古社会发展的具体社会经济条件和封建主义史学史的阶级属性来解释这一现象。与此同时,我还试图指出蒙古史学史的民族特点,区分出反映蒙古人全民族利益和社会需要的那些思想政治潮流。

我认为,蒙古史学史可分为以下四个基本阶段:

- (一)古代和封建制度确立时期的历史知识(十四世纪末以前);
- (二)发达的封建制度和封建割据阶段(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
- (三)满清统治下封建制度停滞和腐败阶段(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
- (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产生和发展(1921年至二十世纪70年代)。

本书只包括前两个阶段,即从古代至十七世纪末。

蒙古史学史之历史自有其特点。它产生于典型的游牧环境之中,发展并丰富了自古以来居住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若干世纪以来形成的史学史传统。

要解决蒙古人历史知识的起源问题,就不能置他们从原始蒙古人和蒙古境内突厥语中居民继承下来的种种传统于不顾。事实已经证明,游牧民族的历史知识成就也如同其文化生活其他领域的成就一样,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世代相传,最终导致蒙古人文字史的产生和发展。突厥语族和蒙古族在其神话和传说方面,在对待本民族起源于图腾祖先的看法方面,在以萨满教观点看待外部世界、看待历史、看待大汗政权方面,以及在记载历史事件的方法方面,都有不少共同

性的题材。“阔阔·腾格里”(青天)崇拜,无论在突厥语部族群的历史政治观中,还是在蒙古语部族群的历史政治观中,都占有中心位置。用十二生肖纪年来作为历史年代学的基础,是游牧民族最伟大的共同成就。

古代蒙古人关于大汗政权的历史政治观无疑是在起源于匈奴时代并延续了若干世纪的那些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国家官职制度基本上是依古代先例制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文史籍中用拓跋语记载下来的那些官职名称,与我们在《纽察·脱卜察安》(《蒙古秘史》)特别是《察罕·图克》(《白史》)中见到的完全相符。

游牧民族的历史知识,综合起来可以称作“游牧史学史”。各个时代在蒙古境内居住过的所有部落和民族,都为创立这种“游牧史学史”作出过贡献。十三世纪蒙古人出现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说是“游牧史学史”的最大成就和最圆满结局。

蒙古史学史原本是在蒙古封建关系确立、统一国家建立的形势下形成的。但是就其起源而言,蒙古史学史具有人民性,因为它产生的基础是民间的口头创作。在这一方面,蒙古史学史上的处女作——《纽察·脱卜察安》是最明显的例证。《纽察·脱卜察安》的特点就在于它与蒙古人的口头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字产生以后,蒙古史学史便在征讨性战争和成吉思汗帝国建立的复杂条件下发展起来。尽管元代曾进行过大规模的编修文字历史的工作,但是当时的历史著作流传下来的却为数不多。因此,我在分析这一时期的蒙古史学史时,不仅以传世甚少的历史文献为基础,而且还借助汉文史籍和波斯史籍《元史》、《塔里黑—伊·扎罕古沙亦》(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扎米阿特—塔瓦里黑》(拉施特丁《史集》)等来复原蒙古人的历史知识。

帝国时代的蒙古史学史曾同三种发达的史学史传统,即佛教史学史传统、汉族史学史传统、伊斯兰教史学史传统有过接触。但是这种情况对蒙古境内历史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帝国



灭亡之后,蒙古人与汉人、波斯人在史学史方面的联系中断了。蒙古征服者运往异国或在异国编撰的一系列珍贵的古代蒙古史学文献,也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永远湮灭在异民族文化之中。

蒙古倾覆(1368年)之后,蒙古史学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继元朝灭亡而来的是封建割据和内讧之争,这不免要在史学史上反映出来,因此即使在所谓“蒙古史之黑暗时期”亦即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蒙古历史的编纂活动依然存在。我们知道,稍晚一些时候的蒙古编年史(特别是十七世纪的编年史)就含有不少采自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文字史料,这说明蒙古人的修史工作有着连续继承性。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某些汉文史籍和波斯文史籍还谈到,这一时期蒙古人的史学史活动的基本形式是编修台吉们亦即诸王、成吉思汗家族的家谱。

从十六世纪下半叶起,史学史活动明显地活跃起来:一方面,蒙古人同印藏宗教历史学派的联系密切了;另一方面,古代蒙古的历史政治传统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结果,一种新的封建佛教史学史的基础于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最终形成,并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得到了广泛发展。

当时,蒙古虽然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但是蒙古史学史并没变成清朝中国官方史学史的附属品。相反,它比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东方史学史的另一个分支——佛教史学史。

佛教也如同基督教那样,在它取得宗教统治权的国家和地区(锡兰、尼泊尔、中国汉藏地区、蒙古、布里亚特等)开始创立自己的史学史。因此,我想就起源于古代印度并在亚洲一系列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且在这些地区具有共性的佛教史学史作一番介绍。

对佛教徒来说,“历史”这一概念是与他们信奉的人世生活是虚幻而短暂的这样一种神学、哲学教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历史现实和历史过程也像人生一样变幻莫测。从这种观点看问题,历史本身倘若不为道德说教和涅槃(人生的最终目的)学说服务,就毫无价值。换言之,历史应当成为佛教道德观的说教者和佛教神学